



远行者·山东青年批评家文丛

决绝与新生

——五四文学现代化转型新论

张光芒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决绝与新生

●远行者文丛

序 言

○朱德发

张光芒于90年代初带着几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和沂蒙人的骨气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三年的攻“硕”学习，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不显山不露水，默默耕耘，知识结构日益厚实，科研能力日益增强，学术功底日益稳固，到毕业时真正显示出思想的成熟、治学的严谨和志向的高远。留校执教从研是其所愿，也是校系的严格选才，他既有强烈的使命感又有精心的自我设计，虽然经受点生活的波折，但并没影响其事业上的进取和学业上的追求，教学上敢于肩重担，科研上敢于啃硬骨头，依然是认认真真地治学，坦坦荡荡地做人，远离是非窝，冷眼看名利，任

2 决绝与新生

商海诱惑力有多大，从未动摇其献身学术之志。继之于97年以优秀成绩考取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的博士生，因我95年被聘为该点的兼职博士生导师，张光芒又成了我指导的博士生。他的坚韧、睿智、稳健、奋发、求胜的人格力量在攻读博士学位过程中得到弘扬，落实到学术研究上除完成个人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的《成功者大智慧丛书·文学卷》、参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等外，一本专论《决绝与新生——五四文学现代化转型新论》（以下简称《五四》）又呈现在我的面前。我赞叹他的学术爆发力，又深深感到他的人格是在人生的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的良性循环中得到不断充实不断优化的。

“五四文学”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每代学者有每代学者心中的“五四文学”。今年正值“五四”运动80周年，作为它的重要一翼和文化结晶的“五四文学”更引起年青学子们的关注，重读“五四文学”、重评“五四文学”、重解“五四文学”、重写“五四文学”已成为近几年他们的共同心愿和学术追求。光芒结缘于“五四文学”是攻读硕士学位阶段，也许受到我的潜移默化影响，当然更是他的学术兴奋点和价值目标所在，使其不知不觉便在他心中凝成了“五四情结”；尽管当时中国学术界充满着阴冷悲凉之气，过分地鼓吹“五四文学”启蒙精神有点犯忌，然而“新生的牛犊不怕虎”，沂蒙人那种“骨气”化为学术研究的“锐气”，于是他采取从语言文体研究入手的策略，踏上了对“五四文学”重读重探重写的征途，《五四》是其在读“硕”攻“博”中初战告捷的成果。我不能武断地说它已成为“重写五四文学”的开创之作，而他力图重写“五四文学”的勘探勇气和闪光足迹却被真实地记录下来，似可看成他为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献礼，也可视为他的学术追求步入一个新境界的标志。

“五四文学”诞生至今已走过80多个年头，比“五四运动”还要长几岁；几乎追随着她的步伐，历代学子进行观照与研究亦渡过80个年头。且不说新时期以前的研究成果之丰；就说新时期以来

对“五四文学”研究之热、探讨之深、触及之广、成果之多、收获之大也是空前的，颇有“百家争鸣”而皆话“五四”之势。面对着历代学者研究“五四文学”取得的如此丰盛的学术成果，当代青年学子立志“重写五四文学”，拟超越或刷新前人的学术研究，“新锐”们的勇气诚然可贵，然而落实到具体研究实践中谈何容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光芒的《五四》所显示出的创新精神、开放思维、独到见解、特殊角度、深微阐释、学理探源等，应似对“五四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难得贡献，也是令我们老一代学人兴奋的可贵探索与突破。

研究“五四文学”的学术性或半学术性的著作和论文虽然不能说浩如烟海，却可以堆成一座小小的书山。为了摸清底细，向“五四文学”的纵深探索，光芒曾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浏览已搜寻到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写成一篇2万多字的述评，从中他也找到一些“可乘之机”或薄弱环节或突破口或误读误解，为《五四》一书的写作至少打开四条通道：一是已研究烂熟的一些命题，如“五四”观念现代化、“五四”文学创作人道主义灵魂、“五四”文学精神、鲁迅周作人等文学巨匠，很难从宏观上突破，拿出全新的成果，于是他就从前人的研究中找缝隙寻矛盾或者选取新角度，加强微观的透视和深细的分析，这样“翻”出来的新鲜见解虽不是整体上的“重写”，但这些“老树新芽”却弥足珍贵，捧读它们能不时地生发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二是从前人研究的偏至中确立新的观照视野和勘探路向，力求对“五四文学”的重写有较大的“突围”。如很长阶段学人们对“五四”文学研究偏于启蒙精神、思想内涵、社会意义、政治功利等，而对于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语言文体研究只是“鸡零狗碎”，缺乏系统的完整的深入的探索，于是《五四》一书就以新的语言文体学对“五四”文学的语言变革、文体解放、新文体建构、时代文体特征进行了有深度有力度的探讨，填补了“五四”文学研究的薄弱一环。三是从理论渊源上发现了“五

4 决绝与新生

四”文学研究中的不少误读，以正本清源的精神重新阐释一些重要的要领或基本原理，重构研究主体的理论思维，然后对“五四”文学研究的一些命题重解重评。如“对五四文学的理性批判”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作者认为，在“五四”文学研究中“理性”是个用滥了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始终缺乏一个统一认识；他所理解的理性概念，既非指传统意义上的控制人的行为的理智力量或单纯的科学理性，又不是先于一切经验并揭示了事物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或是存在着等待人们去发现的精神宝库，它应该是既包含了人们认识社会、自然及人类本身的能力又是引导人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的具有独创性的理智力量。这样的理性是立体的、发展的、动态的，它的结构在深层是逻辑理性（理论理性），表层是价值理性（实践理性），从纵向来看有历史理性与纯粹理性之别，而从横向来看则有政治理性、科学理性、民主理性等。正是从这种理性观出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重新审视重新评价，他发现“五四”标举的理性旗帜更多地局限于应用理性和实践理性层面，尚未深入到理论理性及以“统一性”为特征的体系理性的深层，即使价值理性也未达到以方法论为中心的理性思维高度，并联系运动实践和创作实践对这种理性缺陷及其根源作了令人诚服的论析，这应似以理论概念的突破带来了“五四”文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四是“顺藤摸瓜”贯通 20 世纪中国文学，即沿着“五四”文学精神这根藤蔓的延伸来考察新文学的流变轨迹及其创作果实，然后以果推因对“五四”文学进行反思；在对“百年文学风雨路”的经验教训、基本规律有了深刻认识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国文化：是否需要第四次觉醒？”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时代命题。不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文化建设的角度或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有时发现或提出一个问题比回答或阐释一个问题的意义和价值还要大。且不管中国经历了科技觉醒、政治觉醒、伦理觉醒之后是否还需要来一次理性觉醒；光芒敢于在世纪之交发出这样的呼喊，就足以表现了他的

强烈时代感、使命感、忧患感和青年学子的理论勇气。也许一些高人能从《五四》这本小册子里找出这样的误漏或挑出那样的幼稚，这对一个正在展翅起飞的青年学者来说大有裨益，应该勇敢地去承受；即使一些不正当的指责也不要睬它，按照自己既定的学术目标追寻下去，终有一天重写“五四文学”的理想会变成光辉的现实。

光芒已显示出的学术才华和科研实力，与他持之以恒的勤奋进取的精神境界息息相关；在我的印象里，他这种勤奋进取精神贯注于科学研究中，主要表现于“三肯”功夫上：一是肯下苦功夫。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丝毫马虎，也来不得偷懒耍滑，更不能找歪门邪道；只有脚踏实地，刻苦攻关，把汗水心血洒在对学术孜孜不倦追求与探索的旅途上，方能结出一串串科研成果。他为了保质保量地及时完成一部书稿，白天跑图书馆翻阅室，晚上开灯夜战，拼了半年连回家探亲也舍不得节假日；他撰写一篇论文也是肯下苦功，往往通宵达旦，完不成是不会休息的。我记得怕苦怕累的字眼从未由他嘴里吐出来，无论交代什么科研任务给他，他总是愉快地接受，不惜脑力才力地去攻克它，哪怕是块硬骨头也要一口口啃下来，问他累不累，老是笑着说“没有什么”。有了这种肯下苦功夫的拼搏精神，哪有登不上的科学山头呢？二是肯下深功夫。学术研究就怕浅尝辄止，深不下去，特别是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神秘莫测的感情世界，如果只停留在审美表层结构不能进入深层结构，那就不可能发现无限丰富的审美意蕴；而要不断发掘审美意蕴不只是应有敏锐的艺术感悟力，更重要的则是通过理论思维训练来提高理论穿透力和概括力。光芒拟从语言文体入手研究“五四”文学，除了在史料的辨识、梳理上下深功夫，主要在语言学、文体学上深化理论修养，形成一套新的语言、文体理论模式，以拓展“五四”文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他不满足于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已有的研究成果，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在中西启蒙思潮上下深功夫，特别是西方有关启蒙主义理论的著作能搜罗到的他都钻

6 决绝与新生

研过，并作了详细的学习札记，形成一种新的启蒙文学观。三是下细功夫。学术研究不是粗功夫活而是细功夫活，粗心大意、草率从事是拿不出精品力作来的。我不是说光芒的研究成果已达到学术精品的要求，也不是说他写出的论著已达到逻辑严密无懈可击的地步；仅仅是说他的研究重视在一些细微之处下功夫，能从小的缝隙或微不足道的地方发现问题，推敲琢磨出一些新意思，尤其对“五四”文学的一些悖论冲突、矛盾关系的论析，既能理清其内在的深微联系又能辨明其朦胧模糊的区分度。正由于光芒能自觉地在科研上下苦、深、细的硬功夫，所以他的学术成果和发展势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光芒在学术苦旅上刚刚起步，虽然已有了喜人的成果，但与他学术的高远追求相比容不得半点浮躁之气，只有进一步地充实、更新知识结构，进一步强化、解放理论思维，进一步提高、优化科研才能，才能迎接21世纪学术界的挑战，在激烈的竞争中去实现自己的宏愿！是为序。

1999年4月26日于山师大寓所

目 录

序.....	朱德发(1)
第一章 狂人与超人:五四先驱者的文化人格	(1)
一、应历史呼唤而出的第一代“现代人”	(2)
二、一代“超人”式的思想行为模式	(4)
三、“狂人”式的孤独与内省意识	(10)
第二章 共振与呼应:中国现代最早的文学流派	(17)
一、“文学革命派”的形成	(17)
二、“文学革命派”的流派特征	(20)
三、“文学革命派”的“母体”功能	(25)
第三章 决绝与新生:五四文学观念现代化的辉煌开端 ..	(30)
一、现代化的突破口:中国文学史上的“哥白尼运动”	(30)
二、现代化的深度:对“人”的全面现代性的追求.....	(36)
三、现代化的丰富性:“人的文学观”的审美流向.....	(40)
第四章 发现与拯救:五四文学创作的人道主义灵魂	(53)
一、“血与泪”:启蒙者俯视下的“人”.....	(56)
二、“娜拉出走之后怎样”:智识者平视中的“人”.....	(64)
三、“人之子醒了”:觉醒者的“自我表现”及内省中的“人”	(68)
第五章 求真与重情:永远的五四文学精神	(76)
一、“取下假面,看取人生”.....	(76)
二、一切“本着内心的要求”	(80)
三、迷人的划时代风貌	(83)

2 决绝与新生

第六章 瓦解与重建:五四文本体系的动态建构	(87)
一、总体观照: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	(92)
二、历时考察:五四文体建构与解构的双向互动	(101)
三、共时描述:五四文学的时代文体特征	(111)
第七章 情感与符号:五四作家创作的个案剖析	(124)
一、鲁迅杂文语言的陌生化追求	(124)
二、周作人散文小品的符号学阐释	(132)
第八章 神话与解读:“五四文学观”在二十世纪之演变 ..	(143)
一、“五四神话”的初步确立	(143)
二、解读的悖论:“文学神话”抑或“政治神话”	(156)
三、回归·深入·超越五四	(165)
第九章 光辉与危机:对五四文学的理性批判	(178)
一、五四文学的特殊规律	(178)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缺陷及其根源	(182)
三、五四启蒙文学的内在矛盾与潜在危机	(194)
[附]	
第十章 躁动与寻找:新时期小说的精神变异	(199)
一、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与畸变	(199)
二、离婚现象的艺术叩问	(206)
三、审丑意识与异化感	(213)
第十一章 反思与预言:百年文学风雨路	(217)
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217)
二、寻找文学精神的新旅途	(223)
三、“二十世纪中国十大作家”之我见	(227)
四、世纪末五四的命运:兼谈中国 文化是否需要“第四次觉醒”	(234)
后记	(239)

第一章

狂人与超人： 五四先驱者的文化人格

马克思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①“五四”正是这样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正如人类学家高尔兹所指出的，当一个社会产生政治、经济危机，加上文化迷失方向的时候，那时最需要意识形态来拯救；而意识形态的传播与阐释，则必须发挥文化先驱者的文化中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五四”文化先驱者虽是作为“历史的人”的出现而存在，却发挥并创造了超越普通大众的“人的历史”的作用。胡适曾自信地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一场震惊中外的新文化运动由一班文化先驱者在短时期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尽管后人曾批评他们为一代“欧化”知识分子，站在“万里长城”的另一边，与广大群众相脱离，但这也正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在文化史上的超前作用和卓尔不群的人格特征。

根据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语言符号即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量“五四”文本莫不是那一代人作为存在者的思想、行为、气度、性格的表现，因此，20世纪的人们在深深地迷恋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8页。

2 决绝与新生

“五四”文学斑斓多彩的艺术世界的同时，更在执迷于一代“五四”作家身上所透射出的人格魅力，他们所营造的第一批现代人格的形象及其繁富微妙的心理结构，甚至成为后来者所追随与模仿的典范。可以说，探讨一代先驱者文化人格的成因及其独特的魅力，不仅是进一步理解“五四”文学的深层结构的需要，而且有助于考察中国文学从晚明到清末再到本世纪之初完成现代化飞跃的内在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其人格从“古典”到“现代”转化的过程。

一、应历史呼唤而出的第一代“现代人”

文化人格主要指人在一定的时代社会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与思想态度的统一，指文化思想领域范畴内的个人在做人的尊严、价值、品格诸方面的总和。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在以人道主义同情下层人民的同时，也往往表现出对“自我人格”进行设计的意向。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喻示封建传统之束缚、扭曲人性，犹如文人画士之制造梅树盆景。他提出的“疗梅”办法即是“疗人”，使人的个性得到解放和自我发展，表达了他要求“天公”“不拘一格降人才”，由他们带头进入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从近代开始，知识分子为冲破传统的文化心理屏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争取人格的新生。龚自珍从哲学高度推崇自我，强调自我的觉醒。“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①在近代社会危机的时刻，梁启超于极度焦虑中急切地呼唤“非常英雄”的出世：“不有非常人起，横大刀阔斧，以辟榛莽而开新天地，吾恐其终古如长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梦之，吾顶礼祝之。”^②以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随着社会的动荡变幻，在不断调整着自我形象，尤其

^① 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一》。

^② 《文明与英雄的比例》，《新民丛报》1902年2月8日。

是梁启超，作为当时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刻意塑造着引导民众的“导师”形象。但在他们人格的变化发展中，始终恪守着近代狭隘的改良之志，政治性的“新民”之道与爱国主义思想，因而形成的是一种“外圆内方”的双重人格。梁启超对“非常英雄”的呼唤，也许正源于对自我人格的“无力之忧”。尽管其理想困于“精英救国”的思路，对“非常英雄”之人格特征也心存模糊意识，但那种强烈地寻求崭新意识及呼唤具有超常伟力——能够冲破长夜开天辟地的英雄出现的心态，却正反映了时代潮流所向。到了本世纪初鲁迅那里，他在《摩罗诗力说》中呼吁“精神界之战士”“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世俗，发为雄声……”在《破恶声论》中，鲁迅还呼吁“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这种“一二士”都“不和众嚣，独具我见”，具有高度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意识，即使处于孤立的地位也毫不畏惧。这些观念包含了必须透过文化现象的表层，切入到中国社会最深邃的核心中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思想，为英雄人格注入了现代启蒙者的新内涵。

“五四”时期，鲁迅本着一贯的启蒙主义思想大声疾呼以“个人的自大”为特征的“天才”的出现。“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①这种“天才”或“个人的自大”与近代所谓“新国之才”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虽讲“个性”，但又强调“天演之事，即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梁启超在《天演论》按语中说这种个性仅仅是为了加强国家和民族的共性。他们也讲“自由”，但更强调“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②说到底，“自由”仍是维系于“团体”“公德”的不自由。尤其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学而优则仕”的做官意识，“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人身依附观念，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② 梁启超：《新民说》。

4 决绝与新生

“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人格理想仍存留在潜意识之中。因此，即使清末民初一些自认为是“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的知识分子，也往往会流露出连他自己也不易察觉的封建人格因素，例如章太炎反清义无反顾，即使被关进监狱，还表现出“肝脑涂地而不悔”的不屈气概，但后来他又一度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直到袁世凯复辟时才悔悟，但此时他已经无力走出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人格的阴影。即使曾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梁启超也在世界之交失去了青春的锐气。“五四”时期，封建上层建筑的最高代表——皇权被推翻，充满现代意识的各种西方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首先在心态上迈出了由传统到现代人格转换的最决定性的一步，这就是对真正的个性独立、自我实现的孜孜追求。

二、一代“超人”式的创造的行为模式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借助西方的近现代文化以求解放人的灵魂的，为了唤起国民个性意识的觉醒，先驱者们不约而同地敞怀汲取达尔文、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影响“五四”先驱者世界观与思想观念的同时，也一并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行为方式。而其中尼采的强力意志说及超人哲学可以说对“五四”先驱者自我人格的形成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鲁迅早年呼唤尼采式的“大士哲人”，其主要用意便不在于尼采哲学之构造及其实质，而是其“力抗时俗”、“刚毅不挠，虽遇外物而弗为移”的“超人”式的人格力量。^① 同样，他对“摩罗诗人”、“拜伦式的英雄”的呼唤，郭沫若对惠特曼、歌德、雪莱的推崇也都是看重其强烈的叛逆性格与独立个性，体现出一种全新的人格价值取向。

他们这种“超人”式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以个人参与历史的发展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与创造。在尼采看来，超人是意志、智慧、天赋特别高强的人，他是真理的化身、法律和道德的准绳、价值的创造者。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尽管“五四”先驱者后来很快意识到自己并非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但其原因主要在于“应者”——即国民或尼采所谓“世人”的愚昧与“不争”，作为他们本人来说却仍是有意做一代“振臂一呼”的英雄。他们凭着自己的智慧、天赋，凭着自己对历史与文化、社会与人生的深邃的思考，凭着自己作为先驱者所拥有的“德先生”与“赛先生”的理论武器，向国民与社会发出了启蒙的呐喊。“寄语青年”、“敬告青年”、“告劳动界”……成为他们的首要工作。他们的目的即以自身的人格理想来影响知识青年，进而唤醒更多的国民加入觉醒者的行列，彻底改造“国民性格”，从而实现“沙聚之帮”到“人国”的转换。创造社先驱作家更是毫不隐晦地宣称“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天才的作品”“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觉是不能理解的”。^①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天才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者宣战。”“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②诸如鲁迅笔下的“狂人”，郭沫若诗中的“天狗”、“女神”，胡适笔下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者”、“国民公敌”，文学研究会作家“指导人生，改良人生”的宗旨，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所重视的正是个人的自觉力量对于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大意义。

其次是对个人生命力量的高度推崇与刻意追求。尼采认为，“超人”的身心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能把人性中的最高尚和最卑下的力量在新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生命为个体追求力量的最高感觉，生命本质上是追求更多的力量。”^③柏格森甚至把个人自我

① 《文艺私见》，《郁达夫文集·五》，第117页。

②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③ 《悲剧哲学家尼采》第93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6 决绝与新生

的“生命之流”比喻成力量无穷的“上升的火焰”与飞腾的“火箭”。

“五四”先驱者对一代启蒙思想家形象的自我塑造与他们自觉接受西方现代生命哲学观，极力张扬生命力是分不开的。从根本上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的解放”主题即在于挽救人的生命，改造人的灵魂。通过个体生命力的复活、新生与发展，将所谓“黄人劣种”改造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人。早在1907年，鲁迅就说：“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气，匡纠流俗，厉如雷霆，使天下群伦，或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气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唯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孟猛奋斗之才，虽屡蹈屡僵，终得观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并且断言：“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涛之间，特意力以辟生路者也。”预告了“尚力”时代的到来。^①周作人在其《人的文学》中明确指出作为灵肉一致的个人，其身体生发出的“力量是唯一的生命”，这种生命力使个体的人在人类群体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一样，若要森林茂盛，必须靠各株树木各自茂盛，才能达到利己又利他，利他即利己的境界，也就是要“既要讲人道，爱人类，则必须先个人做起，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地位。”尽管在现代生命哲学体系中，大都将个体的生命本能作为创造的动力和基础，流露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非理性倾向，但其主张的个人主义具有特定的含义，完全异于那种唯利是图、沽名钓誉的个人主义，所谓“成为你自己”，创造自我，就是要求对自己的生存负责，做生命的主人，真诚地放射出自身的能量，寻求人生的意义。这正是周作人强调“力是唯一的生命”的深层文化根源。鲁迅在译介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之后，其文学观更加受到生命美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厨川白村根据柏格森一派的生命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

^① 《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3—56页。

本，又从弗罗特一派的科学，寻求生命的根柢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颇有独创力，“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基于此，鲁迅提出了艺术家的生命意识问题：“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因为文艺的根柢即是“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①他尤其强调，只有生命力弥漫的作家才生出“力”的艺术来。鲁迅文学观追求“力”之美的这一审美指向与“力是唯一的生命”的生命哲学观应该说是一脉相通的。创造社作家似乎表现出了更为显著的生命意识。郭沫若诗中的自我形象被赋予了创造与驱使自然万物的神力：“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他还将自身的生命力的冲动外化为各种自然意象，“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力的光波”，“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以自叙传小说著称的郁达夫尤其以其弥漫于艺术与人生两个方面的强烈的生命意识格外引人注目。他不但认为人们的生存就是“生”的力量的具象化，个个独立生活的背后都潜藏有一种“生”的力量，而“生”的具象表现即是创造，而且“艺术与生活”同是生的力量的表现。他对“生的苦闷，性的苦闷”的大量描写即是源于生命力受到压抑、扭曲甚至异化而产生的“创造的生命的冲动”，这种冲动使个体生命力在艺术世界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彻底的释放。其主人公虽沉浸于孤独、哀伤、苦闷、彷徨之中，却又莫不因自身的敏锐思想和“先知先觉”而感到自尊自豪，可以说这既是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也是作家人格的“精赤裸裸”的外化。

马克思指出，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己本身的自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

^① 《鲁迅全集》第10卷第232页。

8 决绝与新生

动受他自己的控制。”^①“五四”先驱作家有意识地将生命的“潜力”发挥出来，投射于人生，投射于文化意识与艺术世界的具象化过程之中。正是这种“生命力量”的冲动锻铸了“五四”作家的人格“震撼力与冲动力”，表现了他们作为从“沉睡”中醒来的第一代“现代人”的深层文化品格。

第三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决绝姿态。尼采曾说：“对一切价值重新估计：那就是我对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公式。”^②要重新估价的“一切”，包括宗教、道德、哲学、科学、文化、艺术等一切价值观念体系。重新估价实际上就是指出过去一切价值的无价值，力图创造新价值。“五四”正处在这样一个从旧的价值观念体系到新价值过渡的历史转折点上。胡适曾将当时“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概括为“一种新态度”，这一概括也准确地提示出一代“五四”人格表现上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态度。胡适还将这一态度归结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③即“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两个趋向，前者包括了对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学的种种问题——如孔教问题、文字改革问题、女子解放问题、教育改良问题、父子问题、儿童问题等；后者则是介绍输入西方的各种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④将一切重新评判，分别出一个“好”与“不好”来。茅盾也认为“尼采思想卓绝的地方”即是“把哲学上一切学说，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重新称量过，重新把他们的价值估定。”我们“应当借重来摧毁历史传统的畸形的桎梏的旧道德的利器，重新估定价值，创造出一种新道德来。”正是这样一种“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共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② 《现代西方哲学评价》第7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第1022页、1028页。

④ 鲁迅：《坟·看镜有感》。